



作为浪漫主义运动先驱,斯塔尔夫夫人(1766-1817)是与歌德、席勒齐名的欧洲文化名人。著名文艺理论家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一分册《流亡文学》中,以近半篇幅探讨她的文学创作及文艺思想(超过夏多布里昂、贡斯当等人总和),一方面说明这位批评家的“偏爱”(bias),另一方面也说明斯塔尔夫夫人当时在文坛的地位及影响力。就文学创作而言,斯塔尔夫夫人的声望主要凭借两部长篇《德尔菲娜》(*Delphine*, 1802)和《科琳娜》(*Corinne*, 1807)——尤其是后者。照她同时代文学批评家圣伯夫(Sainte-Beuve)的看法:“《科琳娜》作为一部浪漫主义文学史开篇之作,堪称是一座不朽的丰碑。”

当然,任何一种新事物,总不乏批评和反对意见。本书最为人诟病之处,在于它的“感伤性”(sentimentality)——明显受到英国斯特恩《项狄传》及法国卢梭《新爱洛绮丝》的影响——及“软弱性”(女艺术家最终选择殉情以成就爱情理想,这一结局令无数读者唏嘘不已)。但事实上,正如勃兰兑斯所说,这样的指责显然忽略了小说创作的时代背景——自《科琳娜》问世以后,小说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发生了巨大变化;而此前既没有乔治·艾略特、萨克雷、狄更斯,也没有乔治·桑、司各特、特罗洛普。当时欧洲文坛最负盛名的小说是《少年维特之烦恼》——如果“将《科琳娜》与歌德的这部作品相提并论,然后再批评其感伤性”,便不难发现上述说法“不攻自破”:论及“催泪”效果,少年维特之殉情远过于斯塔尔夫夫人笔下女艺术家服毒自杀。

正如歌德《意大利游记》令人耳目一新,《科琳娜》的最大特色在于它不仅以意大利为背景,更以之为重要题材:作者以亨利·詹姆斯式的现实主义手法详细描述了罗马的艺术绘画、大教堂和纪念碑——在旅游指南系列丛书以及“文化名城剪辑”之类电视节目尚未问世的时代,地处南欧的意大利对于当时欧洲大部分地区来说都充满神秘的浪漫主义色彩,因此本书也引发了意大利的“旅游热”。

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于1897年出生于美国南方密西西比州的新阿尔伯尼(New Albany),5岁时随家迁居奥克斯福德(Oxford)小镇,一生除了偶尔的几次外出,绝大部分时间在家乡度过,但他将他的家乡,他想象中的约克纳帕塔法县(Yoknapatawpha),永久性地在文学作品中,正如美国著名作家和评论家罗伯特·潘·沃伦(Robert Penn Warren)指出的,“在所有文学作品中没有任何一片土地能像福克纳构想中的那块土地那样鲜活。”他一生献身于他热爱的文学事业,在他人生的65年中他写出了20多部长篇小说,比如《喧哗与骚动》(*The Sound and the Fury*, 1929)、《我弥留之际》(*As I Lay Dying*, 1930)、《八月之光》(*Light in August*, 1932)、《押沙龙,押沙龙》(*Absalom, Absalom!*, 1936)等,上百篇短篇小说,另外还有戏剧和电影剧本。在他生前,特别是1949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后,他的作品在美国和世界各地被广泛阅读。在他过世后的半个世纪中,他的作品声望丝毫不减当年,并被翻译成越来越多的文字。福克纳对世界其他作家家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包括写出《百年孤独》的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中国的莫言、余华、苏童等。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在大学的英文系读书时初次听到福克纳的名字,也曾拿起英文版的《喧哗与骚动》阅读,但因为作品的艰涩和英语的有限只读了几页就放下了,后来来到美国攻读美国文学博士并执教,在前后20多年中,每过一段时间我就会拿起福克纳的作品,阅读变得越来越有趣和吸引力。特别是近几年来,对福克纳的阅读已成为一种偏爱,深感他作品的深邃。

福克纳的作品植根于他生活和熟悉的家乡的土壤和那里的居民。据统计,他的作品刻画了600多位当地的不同人物,有法官、父母、子女、佃农、牧师、混血儿、智障人、大学生、小业主、邻居、边缘人、信徒和宗教狂等,讲述的也是发生在他们中间的习以为常的故事。比如《喧哗与骚动》讲了一个衰落的庄园主一家人的夫妻冲突、子女冲突和父同子女之间的矛盾;《我弥留之际》讲了一个破败的佃农家庭,为了实现将女主人死后魂归故里的心愿经历了各种挑战,将她的尸体辗转几十英里掩埋的故事;《八月之光》讲述了一个怀疑自己有黑人血统的白人青年受到的歧视、歧视和暴力。这些故事本身并不复杂,但通过福克纳的文学想象,他们栩栩如生地在读者心目中站立了起来,以一群鲜活的形象生动地生活在他为其虚构的约克纳帕塔法县中。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人性中有自私、怨恨、痛苦、落后、保守、偏激、狭隘等,有些人甚至古怪,这些都和当地的经济、文化、传统和习俗息息相关,有明显的南方地域特色。但他们也有坚持、忍耐、良善和人性的尊严。

福克纳讲的是地地道道的美国故事,有美国历史中的一些大事件的痕迹。他善于写他的“邮

经典

斯塔尔夫夫人和她的《科琳娜》：“向一切偏见宣战”

□杨靖

小说一开始描摹的是女主科琳娜赴罗马参加颁奖典礼的场景。她是意大利一位享有盛名的艺术家——“一个仅凭自身天赋和才能闻名于世的男性”,其成就在欧洲获得广泛认可(并将登台荣获“桂冠诗人”荣誉称号)。她在此地邂逅到访的英国贵族奥斯瓦尔德·内维尔勋爵及其同伴戴费依伯爵。奥斯瓦尔德遭遇丧亲之痛(他始终认为父亲之死与他本人难脱干系,并为此感到强烈自责),在友人劝说下来到罗马“散心”。奥斯瓦尔德目睹科琳娜在众人簇拥之下被抬往主神庙——虽然如此抛头露面,在大庭广众之下大出风头,和他理想的妇女形象几不相符——但他却很快被吸引,并产生了强烈的爱意。二人订婚后,奥斯瓦尔德奉命开拔印度前线,不得不忍痛与科琳娜分手。

返回英国后,奥斯瓦尔德偶遇科琳娜同父异母的姐妹露西尔,后者同样光彩照人,但性情温婉,相比于才华横溢但特立独行的科琳娜更符合英国贵族家庭审美标准。在亲友撮合下,优柔寡断的奥斯瓦尔德与露西尔订立婚约。科琳娜闻讯赶往英国,退还订婚戒指,决意自此忘情,将全部身心投入对永恒艺术的追求。不久,由于受人诬告,奥斯瓦尔德以叛国罪被捕,并判处死刑。科琳娜想方设法营救不成,最终选择在刑刑日吞服毒药,在奥斯瓦尔德被枪杀之前死在他的面前。

“科琳娜”,正如法国文学评论家安德烈·谢尼埃(André Chénier, 1762-1794)所说,“虽然还是德尔菲娜的模样,但已经更完美、更独立、懂得让自己的才能全然流露,更加为才华和爱情所激发。”表面来看,小说主题仍是上流社会的爱情——科琳娜对奥斯瓦尔德的挚爱最终演变为一种以放弃其艺术生涯为代价的自我牺牲,也是浪漫小说常见的“母题”(motif):传统女性相较于男性承担较低的社会责任,因此社会习俗要求她在婚恋以及生育过程中作出牺牲。然而正如小说中人物遭遇所揭示的,这种偏见(bias)无疑会剥夺极具天赋的女性在爱情中追求幸福的权利。科琳娜这位浪漫的女主,实际上像斯塔尔夫夫人一样,是一个被社会误解并遭受迫害之人。换言之,小说中的科琳娜,很大程度上即是现实中斯塔尔夫人的化身。

年轻时代,遵从母亲意愿,斯塔尔夫夫人嫁给一位年纪大她许多的贵族。由于志趣不投,二人婚姻生活并不幸福。离异一位后,斯塔尔夫夫人于1767-1830)公开同居,后嫁给一位年纪小她许多的瑞士军官,上流社会舆论一片哗然。同时,由于她在《论让-雅克·卢梭的性格和著作的书信》(1788)以及《论文学与社会建制的关系》(简称《论文学》,1800)等作品中鼓吹民主共和思想,令法兰西共和国第一执政拿破仑(后为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大为不满,这位大人物下令:斯塔尔夫夫人不得从事任何“与政治相关话题”的写作,否则将遭到严惩——这一禁令意味着,今后即便写小说,她也只能写“非政治”小说。

但斯塔尔夫夫人对此禁令置若罔闻。1802年,她在海外发表

书信体小说《德尔菲娜》,在法国国内乃至欧洲范围迅速引起轰动。小说的创作背景是此前一年拿破仑和教皇庇护七世达成的宗教“和解”(Concordat),其中条款变相剥夺了妇女的离婚权。斯塔尔夫夫人以此为切入点,不仅揭露出革命旗下妇女惨遭压迫的社会现实,更对离婚的合法性及实际操作层面的问题进行了全面反思。借小说人物之口,斯塔尔夫夫人抨击法国当时的婚姻制度就是“我不能保证你们幸福,但我至少可以使你们的不幸持续下去”,而她则倡导“离婚自由”:“不幸的婚姻不准离异,会使人一輩子处于绝望悲惨的境地”——尤其对处于弱势的女性而言:“没有什么比强制行为的代价更沉重,而当愉悦本身变成义务时,这种愉悦就成为负担。离婚是互敬、互助、互爱之源泉,是诚实之火之永恒食粮。”直至本书结尾,斯塔尔夫夫人念兹在兹、反复呼吁的仍是以下常识:“人性尚存不完美之处,这才使离婚成为必要。”在她看来,法国统治阶级对此视若无睹,不仅是偏见作祟,更是对人性的践踏。

《德尔菲娜》被政府主导下的评论界判定为“一本离经叛道”之书,在书中作者“长篇累牍地为离婚进行辩护”。与此同时,评论界尖锐指出,这也是“一本极不合时宜”之书,作者选择“在法国重新建立天主教婚姻秩序时出版该书”,可谓别有用心。尽管以贵族婚恋这一寻常主题为包装,但本书关注的仍是敏感的宗教和政治问题,事实上也触犯了拿破仑为包括斯塔尔夫夫人在内的法国文人划定的“红线”。尤其是本书宣扬的自由观——“必须寻找内心自由,它是幸福的保证;而外部自由是由别人赐予的”——在拿破仑看来,这一“思想倾向极其危险”,因为它试图“教育人民去思考他们从未想过的问题——或许他们已经忘记了如何去思考”。拿破仑下令将斯塔尔夫夫人流放,待她悔过自新后方能重返巴黎。

斯塔尔夫夫人显然并未接受“教训”。时隔数年,《科琳娜》的出版再次激怒拿破仑。当时这位法国皇帝正与欧洲一半的国家交战,然而在万机之暇,他对流放中的斯塔尔夫夫人一举一动仍极为关注:要求警务大臣萨瓦里(1774-1833)逐日上报其最新动态,尤其是其居所科佩(Coppet)城堡中欧洲政要及法国名流来往的具体信息。拿破仑原本希望斯塔尔夫夫人在“幡然悔悟”后能在作品中对法国、尤其是对法国皇帝本人大唱赞歌,结果却大失所望。借助书中人物之口,斯塔尔夫夫人将法国人的浅薄自私等“国民劣根性”暴露无遗——就法国大革命而言,斯塔尔夫夫人认为其正确轨道应该将法国导向君主立宪制,但由于法国民众的“狂热”,导致大革命由激进走向“恐怖统治”(Reign of Terror),背离了它的初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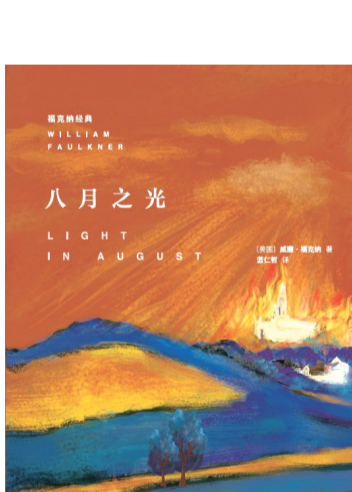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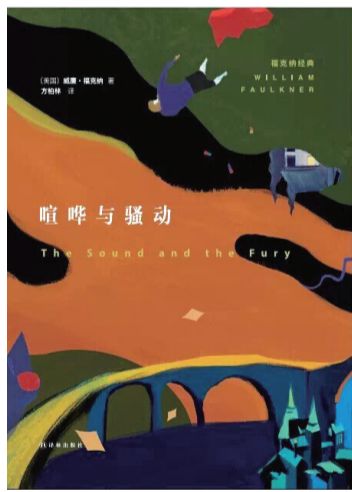
的确,在这部“女性罗曼史”的面纱之下,书中相当篇幅都在暗讽当下时政——其历史背景是当年法俄主导签订的《泰尔西特和约》(1807)——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被迫接受欧洲疆域

福克纳作品的永久魅力

□苏索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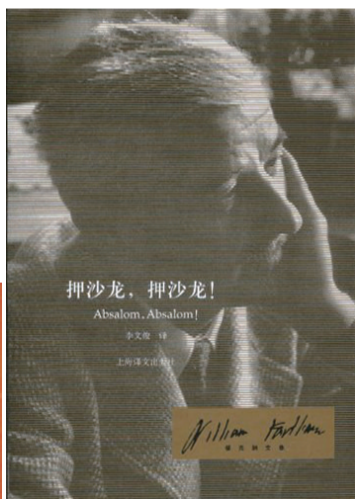
票大小”的家乡,但他总将那里发生的人和事置于广阔的美国历史中。这里有南方的建立、移民、开发、庄园农业的兴起、奴隶制的产生、内战、战后重建、佃农制度、种族冲突、南方的衰落等。比如《喧哗与骚动》讲的就是美国内战后康普生家族由盛到衰的历史;《八月之光》讲的是美国重建到20世纪初南方的社区和种族冲突,而《押沙龙,押沙龙》则写了从1830年到1910年将近百年的南方开拓史和家族发展史。对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福克纳有时会直接描述,有时会间接触及,很少大段详细地描述以冲淡作品的文学色彩。无论如何,福克纳是想让读者明白他的家乡的事件和人物是在美国历史的大背景下发生的,是宏大的美国历史制约着他们作品中事件的发展和人物的命运。他想让他的作品诠释美国,特别是美国南方的历史。

福克纳作品在内容等方面最有魅力的地方则是他们的超越性和世界性。福克纳故事书写人性中的骄傲、尊严、同情、爱等。他在诺奖的答谢词中说,“我深信人类不但会苟且地生存在下去,他们还能蓬勃发展。人的不朽,不只因为他在万物中是唯一具有永不衰竭的声音,而因为他有灵魂,有使人类能够同情、牺牲、忍耐的灵魂。诗人和作家的责任,就在于写出这种同情、牺牲、忍耐的灵魂。诗人和作家的荣耀,就在于振奋人心,鼓舞人的勇气、荣誉、希望、尊严、同情、怜悯和牺牲精神,这正是人类往昔的荣耀,也是使人类永垂不朽的根源。诗人的声音不应仅仅是他的行动的记录,而应该成为支撑人类永垂不朽的支柱和栋梁。”福克纳深感兴趣和尽力挖掘的就是人的属性和生存状态。他将各种各样的人置于家庭、社区、教堂等场景中展现他们的矛盾和斗争。这些场景是再平常不过的背景,然而福克纳将这些场景和人物书写得淋漓尽致,因为他要挖掘出这些人身上代表人性的优点和缺点。如在《喧哗与骚动》和《我弥留之际》中他描述南方家庭的衰落、父母的不协调、儿女和父母的隔阂和家庭之间的争斗。在《喧哗与骚动》中康普生先生整日酗酒成癖,生活无所事事,对世事悲观绝望;康普生太太整日抱病在床,奄奄一息,夫妇两人没有承担起养家的责任,导致孩子与他们的疏离和在缺乏爱的环境中成长。在他们的四个孩子中大儿子昆丁受到了父亲悲观厌世的影响,看到家里衰败和辱辱的状态,在绝望中自杀;杰生愤世嫉俗,对家人充满着抱怨和愤恨,觉得他们使他失去了工作和提升的机会。本吉33岁,虽是成年,但智力等同于一3岁的孩子,生活不能自理;家中的唯一女儿凯蒂性格怪



立、反叛、未婚先孕,造成家庭的羞辱。通过对这些人物的详细描述,福克纳想表达的是这些问题并不只有康普生一家独有,是美国内战后衰落的白人家庭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他希望通过详细描述将每一个人变成一种类型,一个典型,起到一种象征和超越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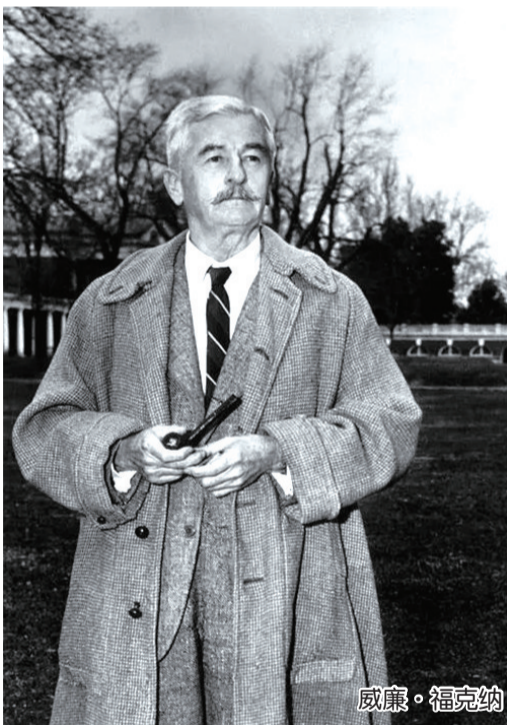
在《我弥留之际》中,福克纳又重新回到家庭和人的主题,不过这个家庭的背景和康普生的完全不同。这是一个穷困潦倒的农民家庭,生存状况极为艰难,日子捉襟见肘。丈夫安斯性格古怪,懦弱,爱贪小便宜;太太爱迪自小受到父亲悲观厌世影响,即人的短暂生存是为了永久的死亡,对生活、家庭不抱有任何希望,因而对丈夫和孩子缺乏温情和爱。五个孩子,即凯什、达尔、约尔、达微和瓦德曼,像被抛弃的弃儿,各自生活在自己孤立的世界,性格古怪和扭曲。在他们中间凯什是唯一一个可依赖的有生活常识的人;达尔整天陷入沉思中,看到的尽是灰暗和消极;约尔寡言少语,性格中掩藏着难以发泄的怨恨;达微整日困扰于她腹中怀的私生婴儿,希望能尽快找到堕胎的救药;瓦德曼是个7岁的孩子,对母亲的死亡和家人的长途跋涉表示困扰和不懈。可以想象这样穿着破烂、赶着一辆破旧马车,在炎热的夏天将臭的爱的尸体运到她祖坟的一家人遇到的挑战和白眼。这不仅仅是一部描写美国南方贫苦农民在埋葬亲人过程中既悲壮又滑稽的故事,也是一部意义广阔深远的寓言,是对人的不同性情、优点和缺点的展现。虽然他们在性格上有这样那样的怪



异,然而在紧要关头他们都以大局为重,最终完成了掩埋爱迪的使命,他们的所作所为可以说是一曲悲壮的人性的赞歌。

再比如《押沙龙,押沙龙》中的主人公赛德潘。他出生卑微,有一天突然来到杰弗逊镇,大兴土木建设他的赛德潘万亩庄园。他通过不正当手段从印第安人那里购得大片土地,又迎娶了当地备受尊敬的菲尔德的长女埃伦,生下亨利和朱德斯。有年圣诞节期间,亨利将他大学认识和崇拜的查尔斯带回家里,查尔斯爱上了朱德斯,赛德潘后来了解到查尔斯的身世。他因为不能接受她血统的不纯洁跟她离了婚,带着他应得的钱财来到杰弗逊,重整旗鼓,建立代表他财富、权力和纯种血统的王国。他当然不能容忍女儿同一个混血儿通婚和乱伦。他将查尔斯的背景告诉了亨利,亨利后来杀死了查尔斯。为了延续后代,在妻子过世后,他试图向他的妹妹罗莎求婚,条件是她必须为他生儿子,遭到罗莎的拒绝。后来,他又同自己几十岁的庄园杂工琼斯的孙女米勒通奸,当得知米勒生的是女儿时,他狠狠地说,“可是你不是一个生下公驹的母马,否则我就会给你安一个马槽”,然后转身离去。

赛德潘不是一个孤立的人物。福克纳对创造



威廉·福克纳

这个人物有更周全、更宏大的计划。他赋予赛德潘更广泛、更深刻的意义,他要让其成为财富、权力、贪婪的象征,即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顾任何亲情、伦理、宗教等。赛德潘代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资本家为了积累财富扩大影响使用的残忍的剥削和暴力手段。在美国南方的开掘和发迹中,类似赛德潘的人物一定很多。他们无情地压榨奴隶和穷人,采取各种非法的手段攫取财富和权力。赛德潘成为这一类人的一个代表。

从以上可以看出,福克纳的作品虽然基于描写当地具体的人和事,但他要传达的信息却是历史和人类广阔和永恒的主题。他的作品描述家庭的衰败、父亲的失职、母亲的冷酷、夫妻的隔阂、孩子的孤独和任性、家庭和社区的隔绝、财富和权力对人性的腐蚀、种族冲突、性暴力等。这些冲突不仅可以发生在福克纳虚构的场景中,发生在美国,而且可以移植到任何国家,这正是福克纳作品的魅力所在。他致力于让他的所有作品超越时代和空间的限制,使读者在阅读时能够感受到作品的广阔和永恒的魅力。

福克纳的成功还启示我们,一个作家要想在文学的圣殿占有一席之地,他必须热爱文学,献身文学,要不断地探索文学的技巧和奥秘,找出最有效的表现故事和人物。福克纳正是这样一位献身文学的作家。在创作的初期,他的作品也屡遭拒绝,但他从不放弃,大胆实验创新,成功地将其意识流、多角度叙述和复杂句式运用到他的作品中。他对文学技巧的执着和探索在作家中独树一帜。

的变更,并同意参加针对英国的“大陆封锁”。在斯塔尔夫夫人看来,这是拿破仑被权力欲望蒙蔽,走向自杀性灭亡的第一步。作为“启蒙运动之女”,她是孟德斯鸠、伏尔泰和卢梭思想的继承者,信仰进步、自由和文明,推崇英国政制。她强烈反对一切形式的专制政体,更不能忍受统治者对思想的奴役,因此对拿破仑效仿欧洲君主实行的专制统治给予猛烈抨击。对于斯塔尔夫人的冷嘲热讽,拿破仑怒不可遏。他亲自操觚,在报刊发表书评,批驳书中对法国的“丑化”,随后再次宣布延长驱逐令——相当于永久流放(斯塔尔夫夫人在拿破仑退位后才重返巴黎)。

与之前的《德尔菲娜》相比,《科琳娜》明显更具社会现实意义。假如说前关注的仅仅是贵族妇女“婚姻幸福”与否的个人遭遇——“在人生所有的不幸中,我设想不出可以与一个女人受到不相配的婚姻威胁的痛苦相比的不幸”,后者则延展至“个性自由”及社会批判——“女人过这种抛头露面的生活……社会怎么能宽恕她怀有才情这个罪过”。小说中优秀的女性代表(科琳娜)沦为怯懦无能的男性(奥斯瓦尔德)的牺牲品,很大程度上印证了斯塔尔夫夫人在《论文学》一书中阐明的“悖论”：“一名妇女一旦崭露头角,显示出杰出才能,那么公众就普遍对她抱有成见……因为名声和妇女的命运相矛盾。”像书中保守的英国贵族所担心的那样,在正人君子眼里,“把自己的精神和身体都展现给公众的女人既魅力四射又深陷危险,她会冒犯、刺激那个在隐秘处等待她的唯一的浪漫情人,并且也许会因此失去他。”这也是科琳娜爱情悲剧的社会根源。

当然,本书的意义并不单单在于提出两性平等的问题,而是如美国文学批评家埃伦·莫尔斯(Ellen Moers)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奠基之作《文学妇女:伟大的作家》(*Literary Women: The Great Writers*, 1977)一书中评论这部影响深远的作品时所说:“《科琳娜》”是一部向一切偏见宣战的作品,斯塔尔夫夫人在这里所揭示的社会偏见事实上远远超出了妇女问题的范围”。照莫尔斯的看法,《科琳娜》可以称作一部探讨“欧洲民族偏见的著作”:奥斯瓦尔德代表英国;他的旅伴戴费依伯爵代表法国。英国人对家庭的热爱本来值得称道,但由此也造成他们的偏见——认为妇女才智的独立发展和家庭美德互不相容,其结果是“家中的天使”(the angel in the house)成为可望而不可即的完美女性(perfect woman)典范,从而导致维多利亚时代“虚伪道德”泛滥成灾。

奥斯瓦尔德的同伴戴费依伯爵是怀有偏见的法国人的典型。他竭力劝说好友断绝和科琳娜来往,因为根据他的判断,这样一个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女子无法见容于上流社会,必定会招致质疑和诽谤。这位伯爵最大的特点是“爱慕虚荣”——据说也是法国人的共同特点:他们的一切行动都是受“别人会怎么说/看”这一顾虑所支配。对此,科琳娜反诘道:“难道我们活着就是为了看别人说我们些什么?难道总要以别人的想法和感觉作为我们自己的行动指针?如果是这样,那我们为什么每个人都有一个灵魂?造物主干脆可以省掉这不必要的工夫了。”

此外,斯塔尔夫夫人也试图纠正英法两国对于德国的偏见。英法自恃为欧洲军事和文化强国,视别国为文化荒漠,也视德国作为浪漫主义策源地在欧洲的辐射力和影响力——她日后在《论德国》(1813)中全方位彰显了德意志文化魅力,以祛除法国人的盲目自大。歌德对此赞赏有加,认为斯塔尔夫夫人的写作“增加了各民族的相互了解和沟通——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科琳娜》被视为“斯塔尔夫夫人最好的一部小说”。斯塔尔夫夫人本人也被誉为“自伏尔泰和卢梭时代以来,法国涌现出的最伟大的作家……是集男性优秀理解力和女性优雅感知力于一身的完美之人”,并由此跻身“古往今来人类最伟大的作家行列”(拜伦语)。